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3.04.016

春秋战国时期陶质包装容器功能考释

邓昶

(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包装品有罐、壶、瓮、陶盒等不同类型和形制, 这些包装容器的包装归属性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食品包装与酒水包装, 其中极具特色的就是包山楚墓出土的陶罐包装, 其包装专属性特征极为明确, 堪称最早的陶质食品罐头包装。然而, 伴随着漆器的兴起和东汉晚期瓷器的烧制成功, 陶质包装容器的包装功能逐渐退化, 并最终被淘汰。

关键词: 春秋战国; 陶质包装容器; 陶质食品罐头; 包装功能

中图分类号: TB48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3)04-0068-05

Function Research of Ceramic Packaging Container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Deng Cha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ottery containe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demonstrate different types and shapes, such as cans, pots, jars, pottery boxes and so on. These containers can be basically classified into food packaging and drink packaging categories, among which the most distinctive is the pottery packaging unearthed in Baoshan Chu Tomb with obvious attributes of specific packaging, and could be called the earliest ceramic canned food packaging. However, the rise of lacquer ware and the success of porcelain firing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led to the gradual degradation of ceramic packaging container's function, and its ultimate elimination in the end.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ceramic packaging container; ceramic canned food; packaging function

0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古代的手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 除了漆木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外, 金属冶炼与制造业、陶瓷制造业、丝织业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从而推动了青铜包装、漆器包装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史前以来的陶质包装容器的发展。

由于陶器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 所以陶质包装容器多流行于下层社会中。

然而, 由于陶质容器有着透气性好、易于制作的优点, 也被上层社会用来包装食品和盛装物品, 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极具包装特色的包装容器。本文结合考古资料, 拟探讨春秋战国时期陶质包装容器的种类及主要功能, 并且试图对包山楚墓陶罐

收稿日期: 2013-05-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资助项目(12K112)

作者简介: 邓昶(1986-), 男, 湖南宁乡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师, 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E-mail: dengchang125168@126.com

包装的功能进行考证与阐释。

1 陶质包装容器的种类

1.1 包装品的内涵

包装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独立使用的容器和一般的日用器具（诸如水缸、水杯、碗、盆、衣柜、衣箱等），在内涵上有根本性的不同。从核心内涵上而言，包装是在物流过程中，为保证物品使用价值的顺利实现而采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单元或系统。虽然包装与日用器皿、器具都是为顺利实现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服务的，但是，相比之下，包装侧重的是保证被包装物品在使用之前其内容、性质、形态、质量等不受或少受损坏，强调的是对被包装物品品质的保障功能；而日用器具则一般是独立使用的，其不具备从属性，日用品的设计与制造，强调的是其作为独立物品的使用功能。当然，包装与日用器皿、器具的区分界线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一定的含糊性和相对性，所以，既不能完全把包装容器与日用器皿、器具绝对分开，同时也不能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诸如马桶、盆、柜等笼统地归纳于包装的范畴。

包装品设计制造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是实用性。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功能，即在流通过程中保护物品的内容、形态与质量，使被包装物品不损坏或较少损坏，以确保物品的使用价值得以顺利实现；二是方便功能，主要是指在实现物品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其所体现出来的便于搬运装载，方便储藏、陈列与展示，以及便于使用（收藏、携带、开启等）的功能。

1.2 陶质包装容器的分类

根据前文中关于包装品内涵的界定，显然不能把陶质容器完全等同于陶质包装容器。因为陶质容器种类繁多，不同种类、不同名目的陶质容器不仅形制不尽相同，而且在功能用途上也大不相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容器在品类上有用作炊器的陶鬲、陶釜、陶甗等，有用作食器的陶豆、陶敦、陶盘等，还有用作盛物器的陶瓮、陶盆、陶罐、陶盒等。这些器物显然不能全部归属于包装范畴，如鬲、釜、甗、豆、盘、盆等容器在器形上就决定了其只能是独立使用的日用器具，不具备从属性，因而不属于包装品。这一时期的陶质容器可以归属于包装品的，大致来说，主要有陶敦、陶罐、陶瓮、陶甗、陶盒等。因为，这几类容器无论从器物形制上看还是从功能用途上来看，都

具备保护物品和方便使用的功能，所以基本可以认定为包装容器。

从陶质材料的不同来划分，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包装容器可以分为：灰陶、暗纹陶、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彩绘陶等种类。用这些性能不一的陶质材料所制作的包装容器，其使用场合、包装对象及其呈现出来的特点各不相同。灰陶所作的陶质容器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大多仿青铜器礼器。暗纹陶包装的产生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得到较大发展^[1]。暗纹陶的出土多见于黄河流域，由于多用细泥进行制作生产，相比之下其显得更为坚固耐用。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多被用作日常实用器，应归属于日常实用包装，其中以盒、罐等包装造型最为常见。彩绘陶包装的纹饰精美，造型丰富，主要用作明器，作为陪葬用。几何印纹硬陶在战国时期盛行于我国的东南部，多为日用品包装，但造型较少。原始青瓷接近于后来的青瓷，常见于战国时期的湖南长沙及江苏无锡等地，虽种类丰富，但主要为杯、碗等盛器，包装品种较少。

2 陶质包装容器的功能

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包装容器在选材上较之前更为丰富，有灰陶、暗纹陶、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等，在器物形制上则有敦、罐、壶、瓮、盒等。不过，就容器的内装物性质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包装容器的功能属性并不是特别明显，基本划分为食品包装和酒水包装两类，且食品包装的数量要远多于酒水包装。一般而言，陶敦、陶罐、陶瓮、陶盒等多用作食品包装，而陶壶则多用于酒水包装。但这些陶质包装容器中也有两种功能兼而有之，甚或还具有用于盛装其他物品的功能和用途。这类陶质包装容器用于包装的专门属性不强，可归入通用包装范畴。如陶瓮属大型陶器，有时用来储存酒水，但主要被用来储藏粮食等物品。湖北江陵纪南城龙桥河西Ⅱ段89号水井出土的战国附加堆纹大陶瓮^[2]，其腹壁与井壁基本垂直，下腹与底较宽，应为窖藏井或冷藏井内贮盛食物的容器（即在水井中置放盛装食物的器物，用以长期贮藏食物或其它物品。《太平御览·居处部十七》引《荆州记》云：“范蠡相越……收四海难得之货，盈于越都……如山阜者，或藏之井壑，为之宝井。”除文献记载外，在秦都咸阳也曾发现有用水井来贮藏食物的遗迹。基于以上两点来看，发现此附加堆纹大陶瓮的井应是窖藏井或冷藏井）。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质包装容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应属罐式容器。不仅如此，在包装制作的新发展方面，罐式包装容器也是最为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洛阳东周墓王城战国陶窑遗址中就曾一次性出土 243 件陶罐^[3]，其中多为泥质灰陶，器形多为敞口，折沿，短颈，圆肩，鼓腹较深，多为腹向下斜收，小平底，一般饰绳纹。由于其质地粗糙，加之造型和纹饰呈现出的简朴粗略、朴实无华的特点，应该可以肯定此类陶罐属社会底层民众所使用的生活日用包装。一般而言，罐式的陶质包装容器式样较多，应是时人针对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进行的设计。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三角暗纹三足陶罐，有盖，小方口唇，鼓肩，腹壁向下斜成收平底，有手捏制的三矮扁足；颈部有两个对称的小穿孔，可能穿绳便于携带之用^[4]。同墓还出土有一件三足陶罐，整个造型与前者基本相同，但容量要较前者小些。其盖口大于罐口，盖与颈部同样有两个对称的小穿孔，可上下通用，加强了包装的实用性功能。

在罐式陶质包装容器中，最典型的是包山楚墓所发现的 12 件均经包裹与密封处理的小型灰色或黑色陶罐（图 1 所示为其中的 3 件）^[5]。这一批陶罐内盛装着各不相同的食品，如梅、炭化植物和鲤鱼等，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完全密封“食品罐头”。这件陶罐在包山楚墓所发现的遗策中被记为“埽”或“确”。这批陶罐应该是古代为贮存腌菜（或酱菜）而专门设计、制作的。《周礼·天官·膳夫》中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酱用百有二十瓮。”此条文献中所说的“酱用百有二十瓮”，据相关学者研究，此处的“酱”即为“肉酱”一类的酱腌菜^[6]。显然，这种食品包装可以看成最早的食品罐头，而这种食品罐头应该是伴随着酱腌菜的出现而出现的。该批陶罐质地坚硬，腹外多饰绳纹、弦纹，少数素面磨光。器形一般为圆腹长颈，高在 15~25 cm 之间，个别小的仅有 10 cm，大的则约 30 cm。



图 1 包山楚墓陶罐包装
Fig. 1 Baoshan Chu tombs packers and parcel

这些密封陶罐在包装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极为

细致的多层密封包装技术。具体操作程序大体如下：罐口由内向外依次用纱、草饼、泥、绢或蕨叶叠相封闭。先用纱布封罐口，上面盖一层草饼，也有将纱置于草饼之上的。草饼用草绳卷绕成圆饼形，再用 8 至 10 道不等的细草绳经向编连固定在罐口上。然后，再用蕨叶作隔离层，或置于最里层，或放在中间层。接着用稀泥涂抹于罐封的二层或三层之上，口、颈涂抹均匀，约厚 0.4 cm，进一步密封陶罐，以防止罐内食品的氧化。在罐封最外面，蒙上一层或二层绢，然后用篾、组带或绦带捆紧。罐封束系结外，再加盖封泥一枚（如图 2 所示），封泥印纹有涡纹和三牛纹两种（图 2a 为涡纹，图 2b 为三牛纹）。封泥下插有标签牌，写明内装食品的名称，有如现代包装上标贴所起到的功用一般（图 3 所示为包山楚墓罐头包装的文字说明）。罐身外用径粗 0.3~1.2 cm 的草绳缠绕，用 6~12 道径粗 0.2 cm 左右的细草绳经向编织，成经纬编织法固定，以起到防震、防摔等保护陶罐的作用。个别陶罐还在包裹绳之外再加套一件带提梁的花编竹篓，以便提携与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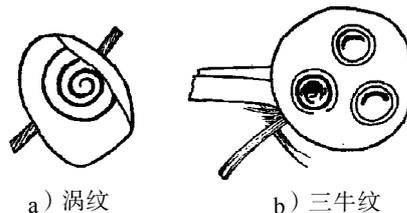


图 2 包山楚墓罐头包装封泥
Fig. 2 Baoshan Chu tombs packers sealed with mu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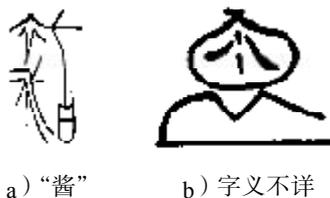


图 3 包山楚墓罐头包装文字
Fig. 3 Baoshan Chu tombs packers writing

这种包装方式，虽然比不上现代罐头包装那样绝对密封，但是却采用了科学的气调包装结构，即允许内装食品新陈代谢过程中释放本身的热量，控制罐内的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比例，保证食品长期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7]。包山楚墓出土的这批陶质食品罐头，虽然比不上现代罐头的制作技术，也不是现代所谓的商品罐头，但是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罐头包装所需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食品罐头工业是以 1809 年法国尼古拉·阿佩尔用玻璃瓶制作瓶装食品为起点^[8]，而这批包山楚墓陶质罐头的出现，无疑打破了这一说法，并将罐头加工工艺的起点提前到了距今约 2 300 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春秋战国

时期的这一套食品罐头包装,不仅反映了时人对饮食品种多样化、高品质的追求,而且体现出了在食品包装贮存技术方面认知的高水平。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曾发现了22件储藏有豆等各类食品的陶罐^{[9][12]},其在包裹方式上也基本上与包山楚墓所出土的12件陶罐雷同,只是在制作工艺上稍显逊色而已。

3 陶质包装容器功能的退化及其原因

由于漆器的兴起和原始青瓷器的出现,加之陶器有着密封性不好且容易开裂与收缩变形的缺陷,因而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包装容器在战国晚期特别是秦汉以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发生了功能上的变化,部分陶质容器的包装功能或退化,或完全被其它材质的容器所替代,或已经不带任何的包装使用性而转化为明器。如仿青铜器造型的钗、尊缶、壘、敦等陶质容器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部分转化为明器,而且至秦以后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陶说·卷四·说器上》中记载:“意为鲁相,修夫子庙,道有瓮,召守庙孔诩问曰:此何等瓮?诩曰:夫子瓮,背皆有书。夫子亡后,无敢发者。意乃发,得素书。”^[10]这条史料的真实性虽然无从考证,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部分陶质容器在功能上已趋于一种象征意义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盒式陶质包装容器,属于新出现的产品。其一般盖、器扣合呈扁圆体,腹较深,圆底,矮圈足。就包装实用性而言,该种陶盒同时具有“包”与“装”的功用,亦满足了保存、搬运等基本功能。然而,据相关研究成果表明,陶盒是战国晚期新出现的替代敦的一种陶礼器随葬品。换言之,即陶盒仅保留了作为容器而存在的象征意义,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礼制文化的更替。如湖北江陵雨台山555号墓出土的矮圈足陶盒^[11]和湖南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陶盒^[12]。这两件陶盒中,尤以后者代表着一种礼制文化的变化,因为战国墓的随葬礼器大都是鼎、敦、壶3种,而杨家湾6号墓则以盒代替了敦^[13]。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汉期间,有一种素面陶圆盒也被用于包装食品。如长沙马王堆出土了6件圆盒,其中3件素面陶盒出土时就盛装有可能用小米制成的圆饼^{[9][126]}。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了52件陶方盒,其中一件藏厨房用刀一把,一件器表上就粉书有“白饭一盂”四字^[14]。可见,这种方形的盒式容器可能是被用来盛装或者储藏食品和食物的包装容器。

陶质包装容器在战国及秦汉以后已经趋于衰落,

这一方面是由于众多性能优越的替代材料的出现,特别是漆器包装的盛行和铜器包装的实用回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原始瓷器烧造技术进步的缘故,特别是到了东汉晚期,青瓷的烧制成功,致使陶质和原始瓷质的包装容器基本上退出了包装的历史舞台。因为瓷质包装容器较之陶质和原始瓷质的包装容器,不仅坚固耐用,吸水率十分低,易于清洗,清洁卫生,而且彩釉不易脱落,通体光滑,透光性好,色泽鲜明,既实用又美观,因而十分符合包装食品、酒水、糖果以及其它物品。再者,瓷土相比其它一般的泥土,可塑性更大,可以满足人们各种不同包装造型的需要。此外,瓷质包装容器较其它材质的包装容装,能适用各种不同工艺技巧来加以美化装饰,如后世瓷器上就有刻、划、印、镂、雕、贴塑等工艺手法以及变换釉色和调整釉色组合等施釉技术的运用。正是由于瓷器具有这些特点,所以瓷质包装容器越来越受到当时人们以及后世帝王、官僚贵族、文人雅士及市井百姓等不同阶层人们的青睐,从而风行了整个封建社会。

4 结语

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和漆器多为奴隶主和各诸侯贵族所占有和享用,下层民众一般无权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青铜和漆器代表着某种统治权力,下层民众无权制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青铜器和漆器的制作成本相对过高,下层民众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而包装作为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之一,是人们无法弃之不用的东西,因此,替代青铜和漆制的陶瓷包装容器普遍流行于下层社会中,少部分还存在于上层社会中。但是,同样也因为漆器的兴起以及东汉晚期青瓷的烧制成功,使得陶质容器不利于贮酒和盛食等天生的缺陷被无限扩大,从而被时代所淘汰。

参考文献:

- [1]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98.
Tian Zibing. History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M].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2004: 98.
- [2]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纪南城工作站.一九七九年纪南城古井发掘简报[J].文物,1980(10):42-49.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Jiangling Ji'nan Cheng Workstation. In 1979 Ji'nan Furui Excavation the Briefing [J]. Artifacts, 1980 (10): 42-49.

-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东周王城战国陶窑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03(4): 545-577.
Archaeological Team of Luoyang City. Luoyang Eastern Zhou Dynasty King City Warring States Pottery Kiln Site Excavation Report [J]. Archeology Reported, 2003(4): 545-577.
- [4]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435-436.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Tomb of Ceng Houyi[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1989: 435-436.
- [5]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196-201.
Hubei Province of Jingsha Railway Archaeological Team. Baoshan Chu Tomb[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91: 196-201.
- [6] 洪光住, 我国各类型酱腌菜起源史[J]. 中国调味品, 1987(1): 22.
Hong Guangzhu. History of Country of Origin All Types of Pickles[J]. Chinese Condiment, 1987(1): 22.
- [7] 刘志一, 中国古代包装考古[J]. 中国包装, 1993(4): 64-66.
Liu Zhiyi. Arch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ackaging[J]. China Packaging, 1993(4): 64-66.
- [8] 赵红州, 大科学年表[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441.
Zhao Hongzhou. Chronology of Big Science[M].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1992: 441.
- [9]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3.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wangdui Han Tomb in Changsha: One[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73.
- [10] 朱 琰, 杜斌校注: 陶说[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124.
Zhu Yan. Dubin Emendation: Tao Shuo[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124.
- [1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雨台山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67-68.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in Jingzhou Area. Jiangling Chu Tomb at Yutai Shan[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4: 67-68.
- [12]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沙杨家湾 M006 号墓清理简报[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12): 20-46.
Hunan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Briefing About Cleanning up of the Changsha Yangjiawan M006 Tomb[J]. Cultural Relics References, 1954(12): 20-46.
- [13] 高至喜, 楚文物图典[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69.
Gao Zhixi. Cultural Relics of Chu[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269.
- [14]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130-131.
Luoyang Distric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eam Compiled. Luoyang Tomb Burning Ditch[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9: 130-131.

(责任编辑: 蔡燕飞)